

台湾光复前国民党对台胞 的宣传及其缺失

——以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为例

冯 琳

内容提要 台湾光复前,国民党当局在外交策略上做出了积极应对,而在接收准备,特别是接收前对台胞民心的聚拢方面,表现得有失消极。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和细致考虑,国民党对台宣传给人以大而无边、空而无物之感。台湾民众有的祖国意识淡薄、对正确的台湾历史缺乏了解,有的被国际托管等错误观念误导,有的渴望回归但缺少对克服困难的预期准备,有的渴望更多来自亲人的召唤和关怀……这些在国民党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中都没有被很好地顾及。国民党未能成功进行民心“接收”的准备,这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关键词 国民党 对台广播 台湾光复 民心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不甘处岛国之境”,形成以战争手段侵略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以图扩张的大陆政策。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该政策的初步实施。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割让台湾、澎湖。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特别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发表对日宣战文,废除中日之间所订全部条约,将对日清算追溯到甲午战争,使台湾地位等同于东北四省和后来的沦陷区。1943年,借开罗会议之机,蒋介石促使美英两国支持中国在战后收回台湾。中国人民用坚持抗战的鲜血和卓越贡献换来了英美对中国的重视,而国民政府通过外交努力,使台湾在战后的归属有了国际法的保障。^①从这些举措看,台湾光复前,在收复台湾的外交策略上国民党当局似乎无可厚非,而在接收作为方面其表现也差强人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已有不少^②,但国民党对台宣传情况及其得失仍是一个研究薄弱环节。^③本文从中央电台对台广播入手,重在考察国民党对台胞宣传方面有何作为及其得失。

① 褚静涛:《论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江海学刊》2005年第2期,第147—152页。

② 如,左双文:《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褚静涛:《蒋介石与台湾收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褚静涛:《国民政府收复台湾考论》(《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白纯:《战后台湾光复过程中的受降与军事接收问题述略》(《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季云飞:《陈仪与台湾教育事业之接收和重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等。

③ 广播宣传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汪学起、是翰生:《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史实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胡耀亭:《抗战时期国民党国际广播电台节目的构成及其特色》(《中国广播》2005年第11期),李佳佳:《回旋历史的声音(中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外广播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抗战宣传》(《中国广播》2005年第11期)等。作者多为新闻、传媒界研究人员,重点在电台变迁的史实重构与宣传要点等方面。

一 收复台湾立场的确定

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孙中山早就有清醒的认识。据蒋介石回忆:“恢复高(高丽,即朝鲜)台(台湾),巩固中华”就是孙中山生前定下的基本政策。^① 民国以降,国民党军政要员不乏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情感者,多有发表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侵略中国的言论。但在收复台湾的力量不足且受《马关条约》束缚的1930年代以前,中国尚无收复台湾的官方表态。日本侵占东三省后,蒋介石开始认真考虑收回台湾问题,曾定下于1942年中秋节“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的目标。^② 1934年4月,蒋介石公开表态:“不仅是东四省的失地我们要收复,而且朝鲜、台湾、琉球……这些地方都是我们旧有领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们手里收回。”^③ 由于当时中日之间尚未进入全面对抗阶段,两国国力悬殊,国民政府面临内忧外患,蒋介石的表态仅被当作减缓抗日派所施加的压力之举,未上升为国策。

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之间进入全面战争状态,收复台湾等失地成为国民政府公开宣讲的目标,复台立场逐渐确定。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讲道:“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说,(朝鲜、台湾)都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所关的生命线……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必须针对日本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朝鲜)、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④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国民党政府带来了更多胜利的希望。于是,国民党政府由“自卫”状态进入“宣战”状态,并昭告中外,所有条约、协定、合同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⑤,否定了《马关条约》和日本占领台湾的合法性。1942年4月,国民党在陪都重庆掀起一场复台宣传运动,孙科、陈立夫、冯玉祥等军政要人纷纷参加,或举行演说,或撰写文章表达收复台湾的立场。《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纷纷出版“台湾光复专刊”,呼吁台湾同胞精诚团结,为收复台湾而努力。11月3日,外交部长宋子文在记者会上,进一步阐明了战后恢复领土以甲午战前状态为目标,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⑥ 在国民党的执政理念中,收复台湾的立场被完全确立。

正因为这一立场,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中,中国明确提出恢复对台湾主权的诉求,并对英方修正案含糊其辞的说法进行有力反驳,最终促成台湾于战后应归还中国之事获得国际认同和国际法的肯定。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谈,并签署了《开罗宣言》。《开罗宣言》经斯大林同意后,于1943年12月1日公布于世。该宣言声明: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并惩罚日本侵略;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地区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日本攫取的中国领土,如满洲(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⑦

① 蒋介石:《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林泉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1年版,第374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9月1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③ 《日本之声明与吾人救国要道》(1943年4月23日出席抚州北路剿匪总司令部扩大纪念周训词),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4年版,第199页。

④ 蒋介石:《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林泉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1年版,第374页。

⑤ 谭合成、江山主编:《世纪档案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100篇文章1895—1995》,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页。

⑥ 《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重庆国际宣传处记者招待会答问》,(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11月4日。

⑦ 上海大公报社编:《国际重要文献》,上海:大公报出版委员会1951年版,第7页。

二 抗战后期国民党对台广播的加强

在收复台湾的立场确定之后,国民党开始加强对台宣传,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利用广播的宣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线广播电台”于1928年8月在南京始建,简称“中央广播电台”。建立之初,该电台功率仅500瓦特,每日播音两个小时,以后逐步增至5个半小时,且采取分割播音办法,每日播音数次,听众仅限于电波所及的东南各省。此时,节目多为传递官方消息、贯彻政令方面的内容,没有专门的对台广播。随着抗战的推进和宣传抗战必要性的提高,中央电台在被迫迁移与变革的曲折历程中,也呈现出日益发展之势。1943年前后,国民党拥有广播电台大小共计14座,合计电力145930瓦特。^①这样的规模和功率,在战事频仍、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依中国当时实力,已属不易。国民党多次将增设电台、加强电力列入计划,但因经费浩大,器材不易输入,未达预定计划的1/10,却也显示了对此项工作的重视。^②抗战后期,广播节目趋于多样化,对台广播成为常设节目。

自1943年4月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聘用在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人柯台山^③,每周在中央电台用台语对台湾广播1次,由该部对敌宣传委员会成员提供广播稿。对台广播时间原规定为每周五下午9时。^④不过,从一些广播稿所标示时间看,实际播送时间并未按此规定执行。如1943年11月3日、1944年11月24日的对台广播是下午5时半开始的。^⑤日期也比较随机,周几都有,并非都是周五。对台广播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项。

(一)揭露日本压迫台胞的事实

对日本压榨、压迫台胞事实的揭露是国民党当局对台广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1943年1月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敌宣传委员会根据密报摘录日本压迫事实,并附密报原件,作为广播主稿素材使用,指示“多多宣传(不怕重复)”。^⑥从密报内容判断^⑦,该密报书于1942年。文中对日本侵华以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以来,日本对台湾变本加厉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军事奴役和宗教麻醉4个方面的事实进行揭露,内容详尽。其中,介绍了1942年日本在台实行的“台湾特别志愿兵”制度的情况,指出这是日本为进一步加强“以台制台”的军事法西斯手段和准备后备兵员的需要。密报提到,1942年2月中旬的台湾《日日新报》报道,自该制度实施以来,至1942年2月15日,志愿兵就达2万余人,写血书表志愿决心者约占1/4。密报称,实际上志愿兵并非真的志愿,而是被迫的。且由于服役年龄只有17岁的下限,而无上限,一些年迈老人也随时有被迫血写志愿书的可

^① 《十一中全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1942年11月—1943年9月),《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5年版,第585页。

^② 《十一中全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1942年11月—1943年9月),《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5年版,第585页。

^③ 许雪姬访问、曾金兰纪录:《柯台山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7年版。

^④ 罗克典签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电台〈对台湾广播稿〉(1943年4月—1944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心编:《馆藏民国时期台湾档案汇编》册16,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以下注释仅注明册16,而未详注出处者,均出自此书。)

^⑤ 1943年11月3日对台广播稿,册16,第90页;1944年11月24日对台广播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敌宣传委员会中央电台对台湾广播存稿(1943年1月—1945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心编:《馆藏民国时期台湾档案汇编》,册14,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页。(以下注释仅注明册14,而未详注出处者,均出自此书。)

^⑥ 《广播主稿》,册14,第57页。

^⑦ 如提到台湾特别志愿兵役制度实施于“本年二月一日”,而该种志愿兵的正式申请时间是1942年2月1日至3月10日,可知密报写于1942年。

能,并以台南州某市七十老翁兒于天被征作军事通译为例,进行揭露。^①

1943年5月12日的广播稿《日本帝国主义怎样剥削台湾同胞》,以若干具体实例说明日本对台胞的剥削。例如,当时台胞每年生产额已达12亿元,按全台600万人口来分,每人平均可得200元,实际每人每年仅得50元。该稿指出,日本对待殖民地人民,“是开始剥夺他们的财产(要钱),继而奴隶他们(要人力),再继而消灭他们(要命)”。呼吁台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②

(二)揭示日本的困境与内在矛盾

一些广播稿揭示了日本的困境和内在矛盾,说明日本的失败是必然结果,以鼓舞士气民心。

1943年5月21日的对台广播稿《日寇〈国家总动员计划〉的礁石》,指出日本于昭和18年提出7项动员计划,重点在增加生产力与将生产力“战力化”,即一方面是物资与人力动员,一方面是钱力与运输力的动员。但实际上该计划行不通,如物力动员方面,日本的铁远远无法满足需要,全日本本土只有5600万吨的藏量,占世界0.31%。战前主要靠从中国、印度与英国输入,日本自身产额仅占需求量的1/30。战争中,日本对铁需求日增,而运输力不足,即便能从占领地掠得,亦难以运达。通过分析,该广播稿得出结论:“日寇各种动员计划本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将把其整个‘国家总动员计划’搁在礁石上。”^③

1943年5月7日的广播稿《日寇当前的难题》则指出,日寇当前最大问题是经济问题,运输力不足是其中的致命伤。只要盟国加强海洋潜艇战,并轰炸日本本土,破坏其军需生产,其失败就不远了。^④

1943年8月13日广播稿《日寇战争思想的分析》,分析日本战争思想,指出日寇作战目的不仅在吞并东亚,还在征服世界;日寇不会主动中途停止战争;日本战争思想是一贯的,要得到远东和平,就要对其战争思想进行彻底改造。该广播稿还对战后处置问题进行了阐述,提出要在战后合理处理日本的问题,防止其再次发动战争,以免“赢得战争而输给和平”。并进而指出废除日本天皇制度,以根绝日本穷兵黩武的战争思想,才是追本清源的办法。^⑤

1943年6月21日广播稿《日寇思想战的失败》指出,日寇思想战失败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华日军战斗意志的日益低落;其二,日本始终无法激励倭军民的战斗意志,无法收揽倭民心。^⑥

1943年10月22日广播稿《日寇的台湾殖民政策及其内在的矛盾》,指出抗日战争加深了日本在台湾殖民政策的内在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会在不久的将来退出台湾。^⑦

(三)展现胜利曙光

发表战讯、分析战局,展示胜利曙光是1943年以后国民党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中最常见的,也是份量最多的部分。如通报3月初我远征军在缅北的重大胜利,通报日寇在我沿海交通已被断绝,并说明这些进展的意义。^⑧

此时的对台广播充分发挥了作为宣传工具以鼓舞人心的作用,将战况发展或具体事件背后的

① 《广播主稿》册14,附件,第72—75页。

② 《日本帝国主义怎样剥削台湾同胞》(1943年5月12日对台广播稿),册16,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3、34页。

③ 《日寇“国家总动员计划”的礁石》(1943年5月21日对台广播稿),册14,第85—86、95页。

④ 《日寇当前的难题》(1943年5月7日对台广播稿),册16,第19、25页。

⑤ 《日寇战争思想的分析》(1943年8月13日对台广播稿),册14,第101—102页。

⑥ 《日寇思想战的失败》(1943年6月21日对台广播稿),册16,第45—46页。

⑦ 《日寇的台湾殖民政策及其内在的矛盾》(1943年10月22日对台广播稿),册14,第111—118页。

⑧ 1943年3月15日对台广播稿,册14,第77—80页。

意义和一些军事家乐观的观察和推测也都加以说明。如,1944年3月3日对台广播稿《盟国海军袭击马里亚纳的意义》,介绍了上个月美国军事进程的重大意义。又如1945年8月9日广播了一些剪报内容,介绍了6日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对日所造成的破坏和伤亡情况,并称军事观察家相信,盟国在考虑对日发出新的促降公告,否则将以原子弹力量使其消灭。^①

对于战争重大突破的消息发布及评论,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如1945年8月7日的对台广播,对中英美合攻日本进行了评论,指出中英美三国对日公告发表之后,英美两国将以全力对日作战的声明也随后发表。“中英美三国已密切联系,动员所有力量来合攻敌寇了”,盟军解决了德国,移师东来,“绝对有把握赢得胜利”。^②

(四)鼓励台胞抗战

国民党对台广播的内容中,也有对台胞抗战重要性的肯定和褒扬。

1943年8月31日中央宣传部对敌宣传委员会发文(对字第327号)《太平洋战事与台湾》,指出:“台湾既然是位于太平洋中之一重要战略地点,故太平洋所发出的一波一浪都足以波及台湾。固此我台湾同胞对于太平洋的任何事变之发生,都应有负有直接间接的责任。”^③希望台胞认清其重要性,若有盟军登陆之日,应争先援助。

1944年3月14日的对台广播稿《太平洋战争的现势》,则指出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优势,日本要扭转战局,惟有依靠海军孤注一掷,但显然他们缺乏这样做的勇气。“日本侵略主义的崩溃就在我们的面前。台湾的同胞们,你们应该注视太平洋战局的进展,准备内应,消灭日寇,这是当前我台湾同胞应有的准备和使命”。^④

1944年7月22日的对台广播稿《盟军对敌(倭)国包围战的开始》,指出:“中太平洋战争的顺利及其积极的发展迟早就会达到台湾本土,台湾同胞应认识台湾这次在日寇利用为南进的据点,积极武装后成为盟国海空军所注目的一个重要攻击地点,进攻日寇本土必以台湾为先。”^⑤呼吁台胞及时醒悟,参加祖国的抗日,与盟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

三 宣传缺失之我见

对台广播关于胜利讯息的播报,关于日本侵略政策即将坍台的分析,关于世界有利局势的展示,无疑都具有鼓舞士气民心的作用,给渴望回归的台胞带来莫大安慰。广播中关于祖国和盟国战讯的传达,使台胞更清楚地掌握祖国抗战动态,以作出配合。如1945年2月8日,广播介绍了战局战况,指出:“盟军即将迫近日本本土,呼吁‘请准备吧!准备响应盟军将来的进攻,准备奋勇杀敌报国,清算五十年的血债吧!’”^⑥其中亦充满祖国对台胞的关切表达和激情呼唤。1944年7月7日广播云:“台湾的同胞们:你们在日寇的压迫下过着痛苦的生活已经长年累月,祖国的父老们无时不在关怀你们。”^⑦1943年11月3日广播说:“祖国每一个同胞都在怀念你们,希望大家从速反省,大家

① 1945年8月9日对台广播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审组编1945年6、8月份台语播稿汇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心编:《馆藏民国时期台湾档案汇编》,册33,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54页。(以下注释仅注明册33,而未详注出处者,均出自此书。)

② 《中、英、美三国合攻日本(评论)》(1945年8月7日对台广播稿),册33,第246—250页。

③ 《太平洋战事与台湾》(1943年8月31日中央宣传部对敌宣传委员会发文),册14,第119页。

④ 《太平洋战争的现势》(1944年3月14日对台广播稿),册14,第161页。

⑤ 《盟军对敌(倭)国包围战的开始》(1944年7月22日对台广播稿),册14,第190页。

⑥ 1945年2月8日对台广播稿,册14,第237页。

⑦ 《日寇崩溃与台湾解放》(1944年7月7日对台广播稿),册14,第181页。

团结起来,打击日军,恢复我们的失地与自由。”^①这些关切之语及呼唤之声对台胞民心具有一定召唤作用。

不过,笔者想从光复前的对台广播重点揭示国民党对台接收“软件”准备的不足之处。从国民党中央电台广播内容所反映出的对台宣传缺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缺乏祖国意识和历史认同感

日本统治台湾的政策大致分3个时期:从189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倾向于暴力镇压,台湾民众的反抗形式多为武装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台湾为基地,推行“南图北进”,以怀柔手段对待台湾民众;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在台实行“皇民化运动”的同化政策,台湾民众或反战或到大陆组织团体参加抗战。^②台湾光复前的几年,日本殖民者除在政治上实施总督专制、经济上掌握台湾金融命脉和工农业之外,更为重要的变化是,越发倾向于文化和教育上的同化与灌输。加之台湾被日本统治将近半个世纪,不可否认,部分中青年台胞对祖国的认同感越来越淡漠,有些人甚至已经认为自己是日本人。1942年1月初,日军占领马尼拉,当时台湾第一大报《台湾日日新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场胜利。5日,报称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在台北、台中、嘉义等地挥舞着日本国旗,高唱日本歌曲,狂呼“万岁”。^③甚至光复5年之后,国民党中央还在会议中指出:台胞年在45岁以上或尚在小学、初中学习的青少年学生对祖国尚有相当怀念或了解,20至35岁的青壮年因对祖国无从认识,且受日本教育的误导,对日本有下意识的依恋。^④

不仅台湾有不少人缺乏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当时大陆也有民众认为台湾是“外国”。台湾义勇队在大陆活动时,就遇到被一些大陆同胞看作是“外国人”的误会。^⑤尽管国民党当局在重要场合一向严正表示台湾属于中国,应在战后归还中国,却忽略了利用宣传加强对民众日常舆论的影响。国民党官方虽将筹设台湾党部当作推进“海外党务”的一项重要措施^⑥,而未将其作为本土特殊区域党务进行操作。虽然当时台湾由日本进行事实上的统治,筹设该地党部的经费需以外汇支持,这是事实,但倘若在党内仍将其作为“国内”领土对待,亦会彰显执政党对待国土的原则性和收复失地决心,从而对党众产生心理上的暗示与激励效应,无形中起到宣传作用。

国民党对大陆民众和党员的宣传弱点同样表现在对台宣传工作中。在抗战后期的中央对台广播中,鲜有宣讲台湾历史及其与大陆关系的稿件。在1943年1月至1945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敌宣传委员会中央电台对台湾广播稿中,有34篇广播稿和1篇提供素材的广播主稿。其中仅1篇指出台湾自古是中国故土的历史,还有1篇提到割让台澎的历史,其余均为战讯战况通报或日德困境分析,讲述日本如何剥削台胞,追溯先烈抗争史,呼吁台胞配合打击日寇等。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审组编的1945年6、8月份台语播稿21篇中,有关军事进程或战争重大消息14篇,国际战争形势评论1篇,处理战后问题的新闻、书告5篇,国民政府的国际政策与建国方针1篇,没有1篇介绍台湾与大陆的血脉关系和历史渊源。^⑦

① 1943年11月3日对台广播稿,册16,第98页。

② 吕芳上:《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运动(1940—1945)》,高纯淑编:《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五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452—453页。

③ 《くまこう陥落萬歳!きのみ全島旗の波》,《台湾日日新报》1942年1月5日,第4版。

④ 《中央改造委员会第164次会议纪录》,1951年7月2日,台北:党史馆藏中央改造委员会档案“会议类”,卷宗号:6.41/249。

⑤ 蔡人龙:《我们是外国人吗?》,《台湾先锋》第6期,合订本下卷,第81—82页。

⑥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密函》(1941年3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心编:《馆藏民国时期台湾档案汇编》,册11,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⑦ 《中国抗战与台湾》(1943年4月16日对台广播稿),册16,第3页。

在台湾已被日本占据近50年之久、一些人祖国意识和历史认同感已相当淡薄的情况下,在56篇文章中仅有1篇追溯了台湾与祖国的历史关系,这样的力度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就是这样1篇广播稿所讲历史也是不全面、不详细的。它仅从明朝崇祯年间郑芝龙率数万福建饥民入台湾垦荒开始讲起,未提及宋朝对澎湖的治理和元代澎湖巡检司的设置,更未提及早至三国时期和隋朝的探险与管理以及考古发现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密切关系。这篇广播稿的作者认识到:“这一段宝贵的历史,我们的敌人自然不愿意提起,使我们的台湾同胞知道。恐怕在我们的台湾同胞中,忘记这段历史的人亦不少数,甚至在祖国的同胞中知道而重视这段历史的人亦不很多,这不能不算是极遗憾的一回事。”^①可惜,该稿作者未能深入挖掘、展开阐述;可惜,其他撰稿人未有如此清醒认识;更为可惜的是,国民党当局未能在对台宣传工作中强调这样的认识。

(二)忽视对错误言论倾向的批驳与纠正

“台独”是近年来对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言论,若追溯起来,可溯至二战以前。大体而言,战前的“台独”大多为台湾民族运动性质,本质上对抗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战后的“台独”,所要对抗的是国民政府(后来转变为中共政权)。二战后期虽未形成当下所指的分裂祖国的台独运动,但已出现具有此类目的的言论,其源头主要来自美国。当时,美国部分政客在台湾问题上炮制“托管论”,并暗中推波助澜。国际托管是二战后期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而制造出来的,是其远东战略的一部分。太平洋战争引发一些美国政客对作为远东战略要地的台湾的觊觎。美国国防部专门设立远东战略小组,考虑如何将台湾纳入掌控范围。该小组成员之一,当时美国驻台湾领事馆的海军情报官柯乔治指出:台湾可临时由联合托管,在此期间,台湾人民以公民投票决定其政治命运。^②开罗宣言发布后,为免与其产生直接冲突,该战略小组回避“托管”二字,提出较隐晦却有同样实质的计划,即:美军自太平洋攻占台湾,战后由台湾民族自决,成立“共和国”。

“托管论”无疑是荒谬的,此处不驳。在接收台湾之前,国民党对以此种言论为代表的错误论调虽有一定警觉,曾在某些场合驳斥美国部分人士妄图染指台湾的设想,反对战后台湾由国际共管的言论。但这样的警觉在对台广播中没有体现,笔者从该时期对台广播稿中,没有发现对这些论调有针对性的驳斥或纠正。

(三)缺少祖国情况的介绍和对重建困难的预期

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不但使台湾与大陆消息隔绝,还进行了适应自己统治的、扭曲历史的教育和宣传。台湾调查委员会^③主委陈仪曾向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指出,几乎半数台湾人接受着日语教育,50岁以下者对于中国文化及三民主义等大多没有了解的机会,对这些感到“茫然”。^④实际上,令其茫然的,不止是祖国文化、三民主义,还包括当时中国的实力、与日本的差距、战争中的牺牲等其他方方面面的东西。广播是光复前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重要途径,国民党却没有好好利用这个途径向台胞介绍祖国的情况,造成台湾民众对祖国状况的无知。他们只能从祖辈、父辈那里听到一点对遥远过去的回忆,或从日本的宣教中获得一些扭曲的概念,无法建立对祖国较为具体正确的认知。

广播中也缺少对重建困难的预期。虽然在当时宣讲重建困难似乎为时尚早,不利于鼓舞士气,

^① 《中国抗战与台湾》(1943年4月16日对台广播稿),册16,第3页。

^② [美]柯乔治著,陈荣成译:《被出卖的台湾》,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③ 1944年4月17日在《马关条约》签订49周年之际,国民政府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下特别设置台湾调查委员会(简称台调会),由陈仪出任主任委员,筹划接收台湾事宜。

^④ 《陈仪致陈立夫函》(1944年5月10日),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胜利前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准备工作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史料》1989年第3期,第21页。

迎接光复,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提前为战后工作埋下一些伏笔应该是明智的先见。因为光复前没有让台胞做出这样的心理准备,战后初期又大肆为抗战胜利的丰功伟绩和大国形象的树立歌功颂德,导致台湾民众心理预期过高,与后来重建中遭遇的种种难以走出的困境形成极大落差,这使不少台胞无法适应和接受,成为“二二八事件”诱因之一。^①

(四)缺少针对特殊地区与人群的宣传

国民党对台广播还有一个缺失就是没有顾及到台湾特殊地区与人群的特殊性。台湾地形多样、民族情况复杂。地形有台地^②、平原、山地、盆地和丘陵5种。山地多平地少,山地面积约占全岛的2/3,东中部大部分地区是高山和丘陵,山高水急。岛内原住民有雅美族、排湾族、卑南族、鲁凯族、阿美族、邹族、布农族、赛夏族、泰雅族、邵族等。山地各族有各自方言,不但平地人不懂,各族间也不相通。^③种种资料显示,光复前后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当局缺少对这些特殊地区与人群的关注。当时,台湾调查委员会的一种观点就是应将台湾视同内地一省,并称这里无特殊宗教与习俗。从台调会的座谈会记录中,我们又看到,这种观点有人附和而无人反对。^④当时台湾所谓“蕃族”虽然人数只有15万,却不能完全将其忽略。尤其在收复问题上,倘若兼顾到这些人,并加以得当宣传,应能树立更为亲善、亲和的形象,博得更多人心理上的认可。而国民党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一以化之、大而论之,缺少对台湾特殊性,特别是山地、离岛这些特殊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特殊心理的考虑。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逐渐确立了收复台湾的立场,并加强了对台宣传。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通过中央电台加强对台胞的宣传,其宣传内容主要是揭露日本压迫台胞的事实,揭示日本的困境和内在矛盾,展现抗战胜利的曙光,以鼓舞台胞的抗战斗志。中央电台对台广播在呼吁台胞配合盟军、打击日军、积极参加抗战,以及鼓舞台胞士气民心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中缺乏祖国意识和历史认同感,忽视对错误言论倾向的批驳和纠正,缺少对战后重建困难的介绍,忽略了对台湾特殊地区及以原住民为主的特殊人群的宣传,是国民政府对台宣传政策的失误,从而导致国民政府对台胞民心“接收”准备不足,也是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冯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白纯:《简析抗战时期的台湾调查委员会》,《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第156—157页。

② Terrace,沿河谷两岸或海岸隆起的呈带状分布的阶梯状地貌。

③ 柯芹:《认识环境,改造环境——献给本省山地党务辅导委员会》,《台湾党务》第14期,第6页。

④ 《台湾调查委员会第一次座谈会纪录》(1945年7月13日),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胜利前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准备工作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史料》1989年第3期,第3—6页。